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君权制约传统 及其启示

成云雷

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误用和滥用，因而反腐倡廉的关键就在于对于权力进行制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权力制约方面积累了悠久而丰富的传统。这些传统或表现为进步思想家的观念，或表现为一定朝代的政权运行制度，或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心理。从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对于古代廉政文化传统的研究和借鉴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由于君主在古代政治中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居于权力运行金字塔的顶端，因而研究我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传统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治国智慧和构建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天制君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天的含义十分复杂，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作者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同一作者、同一篇章的不同段落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天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含义不仅仅是人们头顶上的自然之天，也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超越之天。天是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之源和价值之源。《论语》里说“唯天为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君权制约传统及其启示





大”,《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孟子》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易传》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在上述语境中,天表现的都是最高、最后和最尊的终极性意味。

在古代传统中,尧舜禹汤等古代圣王是现实君主学习的模范,其权力来源于天。《论语》记载了尧、舜、禹权力转移的依据在于天意。尧在传位给舜时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意思是,如果舜统治得不好,天下百姓处于困穷之中,那么上天赐给舜的统治者地位就永远终止了。此后的《孟子》在解释尧能够把位置传给舜,舜能够传给禹,禹传给伯益却最终由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君位,由此开始了由禅让而世袭的传统(《孟子·万章上》)。孟子在构建和解读上述历史时,一概名之曰“天与之”。尧、舜之间的禅让是天意,禹、启之间的世袭也是天意。孟子喜欢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者的出现是天意。与此相关,天意难测,王者的不出现也是天意,而孟子最为推崇的孔子有王者之德却未能拥有王者之位也是天意。

《易传》作者较孟子更为激进,肯定了革命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天,代表某种终极性的力量,决定着人间历史的走向。相对于人世间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君主来说,显然天的地位更为尊贵和神圣。

正因为人间君主在天的决定作用面前只能采取顺应的态度,古代君主都要善于揣测天意,才能比较好地承担君主责任。古代圣王大都善于“仰观于天,俯察于地”,通过领悟天意而则天立法,构建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一旦出现某种特殊的天象或者自然灾害,统治者则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请求上天的宽恕。商代的开国





君主汤在夺取夏的政权建立商朝后的一段时间,曾经五年大旱,汤采取自焚的方式向上天祈祷:“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吕氏春秋·顺民》)汤恳请上天直接惩罚自己,不要降灾于百姓。结果,百姓满意了,天也下了雨。

显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不仅是政权转移的依据,也是赏善罚恶的神秘力量。西汉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通过构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明确地将各种自然灾害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上的缺失,而政治上的缺失其原因又在于君主的失德或者失策,这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君主。《春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董仲舒将之神秘化,认为可以“以此见悖乱之徵”(《春秋繁露·二端》)。在《春秋繁露》的《五行顺逆》等篇章中,董仲舒详细阐述了王者的各种失德行为所引起的五行混乱,如王者淫乐、饮酒、劳役过多,就会导致树木枯槁,鱼龙深藏;而王者听信谗邪,疏远忠臣,杀害世子,乃至以妻为妾,就会导致火灾,凤凰高翔,而猫头鹰等怪鸟到处都是;王者如果大兴土木,在建筑物上雕文刻镂,就会五谷不成,百姓会生各种怪病;如果君主喜欢战争,就会冬天不结冰,金属无法熔铸;如果君主不按时进行祭祀,上天会降下水灾,百姓就会得浮肿、水胀之类的病。董仲舒的“灾异论”认为上天有自己的意志,人间君王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发出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臣下亦可借灾异之徵,予以规劝。更重要的是灾异将会在民间造成恐慌和怀疑,影响政治局面的稳定,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打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董仲舒的儒学成为官方的





意识形态,其“君权神授”的主张成为君王自我神化的理论依据,而其“天人感应”的灾异论则成为历代大臣限制君权的思想武器。实际上,这是在古代社会无法用明确有效的法律制度对君主进行权力控制和约束的情况下,大臣们试图借助天的权威来限制君权膨胀的一种努力。

二、以道制君

在道德价值和君主权威两者之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向认为道德价值更为重要,所以有“从道不从君”的说法。“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这是荀子的话,意味着对于道义的选择属于高层次道德。荀子之前的孔、孟已经有类似的思想。历代思想家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说的就是儒家圣贤对于文化价值的追求。孔子在春秋数百年战乱中渴望和平统一,期望得到明君的重用,但他一直坚持仁道的原则,所以一辈子不得志,他更看重的是文化的价值而非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诸夏虽然没有统一的君主,但是有深厚的文化积累,还是胜于虽有君主而文化上比较质朴的野蛮民族。孔子为殷人之后,却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认可周文化,主要也是看重周公制礼作乐以后周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孟子则认为“天爵”高于“人爵”。天爵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道德尊严,人爵是世俗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孟子一生见过不少君主,每次都能保持大丈夫的气节,也与这一思想有关。有国君曾经想给孟子万钟的待遇,孟子说:“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公孙丑上》)齐王以生病为由,想让孟子主动拜访他。孟子说,天下值得尊重的因素有三个:爵位、





道德、年齿,自认为道德超过齐王,齐王应该先来拜访他。孔孟以后,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名臣以身载道,他们的人格对于君主也是一种道德制约。汉高祖马上得天下,儒生陆贾曾经批评他“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酈生陆贾列传》)朱元璋打天下时,也特别注意争取刘基、李善长等儒生的支持。

儒家知识分子的“以道制君”,首先是以圣人之道来制约君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王合一。圣人是具有最高道德和最高智力水平的人,最适宜当王。历史上的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王者,孔子虽然没有为王,但在汉代的纬书中一直被称为“素王”,没有帝王之位,却开创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制度。纬书说,孔子为汉立制。刘邦以布衣登天子之位,遵循的是孔子立下的制度。后世儒者关于圣人的言说,或出于史实,或出于虚构,但都是试图通过关于圣人的话语给现实君主树立一模仿、学习的典范。历来的君主都要遵循圣人之道,否则就被称为昏君。圣人道的核心是“仁义”,与之相应,作为君主,就要具有关爱民众的仁爱之心和公正无私的高尚品德。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康熙喜欢韦小宝称其为“鸟生鱼汤(尧舜禹唐)”,虽然是小说家言,却也不完全是虚构。

以道制君的第二个方面是以经典制君。圣人已死,圣人的言行只可见之于经典。儒家的经典或为十三经、或为《四书五经》,不同时代有所区别,但经典中所记载的圣王言行都体现了圣人之道,也都是君主必须遵循的。封建时代的君主对于皇子、太子的教育也主要是由太傅、少傅之类的大臣教之以儒家经典。在明清时期,大臣也定期和君主一起研习儒家经典,称之为经筵。

开国君主虽非古代圣王,但创立一个朝代,确立一些制度,这





些祖宗家法也体现一些比较合理的治国之道，也是后世君主应该遵守的。如宋太祖主张“善待文臣”、明太祖“严刑惩贪”、康熙的“永不加赋”，对于后代皇帝来说，都是祖宗家法，都有一定的约束力。

在传统社会，开国君主以暴力夺取天下，称王败寇固然有非人道的一面。但暴力既能夺取天下，则必有一定程度上的民心的拥护。所以一个朝代之初，权力的来源自有其合法性的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后的君主地位靠世袭继承而来，他们养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有位而无道，有势而无理，其德其能皆不足以承担治理天下的大任。所以，从汉代以后，治理天下的行政权力往往掌握在宰相或丞相手中，而丞相等地位显赫的大臣一般产生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学习圣人之道，或通过察举或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实际的掌权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三公”坐而论道，相权对于君权的制约有其制度性的传统。但在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明清两代君权不断膨胀，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也日益走向专制。

三、以民本制君

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对滥用权力进行限制，因而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话语构建是其理论前提。中国古代社会是君权至上的社会，对君主权力来源的话语建构是古代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理性不发达的早期历史阶段，君权神授是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殷商统治者信奉绝对主义天命论，商纣王就曾经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堪黎》）在殷人看来，打雷、下雨、战争胜败乃至政权更替，种种自然和社会变革都取决于天。所以，殷代的贵族统治者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运用巫术沟通天意方面，目前，考古挖掘出来的甲骨文大多数与求神问卜有关。从神本论的天命观来看，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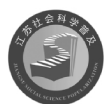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在于上天的眷顾和宠爱,君主只要按时祭祀,虔诚地侍奉上天,即可保持和延续本民族的统治。

在殷周之际的历史大变革中,“有命在天”的殷商被偏居僻壤的小邦周取代,当时一般的人们感叹天命无常,认为是上天抛弃了殷商民族。但是,作为大政治家的周公则致力于探求时代变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周公看来,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怎么才能认识天命的变化呢?周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意思是上天以民众的耳目为耳目;又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意思是把来自民众的评价当作执政好坏的一面镜子。民心民意成为观察政治得失、社会治乱的标准,从而给天命增加了新的内容。

正因为看到民心民意在政权转换中的巨大作用,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主旨在于确保周王朝长久地维持自身统治,要求统治者致力于自身德性的完善,使百姓得到安康。周公提出了勤于政事和摒弃荒政、体察民情和敬慎刑罚的主张。周公关于天命不是固定的、天命通过民情表现出来和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标志着先秦民本思想的萌芽和发生。周公注重人事,肯定了人为的重要性,认识到民众对于稳定政权的重要性,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以德行事。

周公的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进一步发展。《左传·僖公 19 年》记载,宋襄公为了谋取霸主地位,竟然用一个小国的君主作为牺牲祭神,试图以此立威来恐吓东夷。司马子鱼指出:“民者,神之主也”,认为民众相对于神而言更为根本,这样做不会达到目的。此后不久,随国的贤大夫季梁说:“夫民,神





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虢国的史臣懿断定虢国将亡，其依据是：“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在占卜说明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时候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这是最早的“立君为民”的思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子产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思想，认为国君不称职，民众可以批评甚至反抗。

春秋而后，随着邦国兴亡的政治斗争的加剧以及民众大规模反抗行动的日益频繁，民本思想逐渐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共识。为结束天下无道的混乱状态，各派思想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民本政治主张，为社会秩序建构提供思想支撑，其中尤其以儒家影响最大。孔子提出“仁爱惠民”“富而后教”的思想；孟子提出“民贵君轻”“制民恒产”的思想；荀子的提出“君舟民水”“立君为民”“君以民为本”的思想。老、庄推崇小国寡民的社会秩序，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无为而治”“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其实质是主张统治者不扰民。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尚贤使能”“强本节用”等思想，致力于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法家虽然比较推崇君主专制，但也提出了“君权民与，立法安民”“仓廩实而知礼节”等含有民本因素的思想命题。

发端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民本思想在此后的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汉代贾谊提出“民者，万世之本”，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张载提出“为生民立命”，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的民本思想更是成为近代进步思想家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本土文化资源。与之相应，民本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运用在古代社会





的政治实践中,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出现都与民本思想的支撑有关,李世民和包拯等历代明君和清官的人格特征也离不开民本思想的孕育,历代农民起义也频频运用民本思想对封建皇权进行武器的批判。

概而言之,早期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是民相对于神更为根本,随着政治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在中国传统社会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本是相对于君本而言,围绕着君与民的关系形成了多方面的理论内涵。其主要内容是:民众对于稳定政权的重要性比国君重要,国君的存在是为了民众的利益,民众的利益是君主拥有政治权利的合法性依据。一些进步思想家甚至主张,如果统治者未能很好地造福民众,民众有权利推翻甚至诛杀之。孟子在评价武王伐纣时就说“闻诛一夫纣矣”。孟子之所以推许尧、舜、禹为最为理想的王者,就在于他们具有治理洪水、驱逐猛兽和人伦教化等救护苍生的历史功绩。从民本思想的角度来看,国君存在的合法依据在于造福民众。如果国君不能造福民众,则民众有权推翻他。在儒家关于改朝换代的历史话语中,顺乎天是虚的,顺应民心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一个君主被认定为如历史上的桀纣之类昏君,接下来的命运只能是被“贵戚之卿”废弃或者被暴怒的民众杀掉,而在早期儒家的著作中,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四、以言谏制君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监察制度在进行权力制约和防止权力腐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监察制度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针对百官的御史监察系统,另一是针对君主的言谏系统。本文仅就针对君主的言谏制度进行简略的探讨。谏是监察的一种特殊形式,以规正君





主的不当决策或不妥行为。担当此职责的人被称为谏官或言官。谏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保氏”和“谏氏”，其职责为“掌谏王恶”（《周礼·地官》）。封建社会早期的给事中、谏议大夫、侍中等官员都是言谏之官，他们的工作就是随从君主，供君主“顾问应对”，在君主身边起着劝谏作用。隋朝时，给事中等谏官集中到门下省。唐朝初年的高祖和太宗有鉴于隋亡的教训，特别重视谏官的作用。唐太宗于贞观年间，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职权划定，其职责为“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唐代皇帝的诏书由中书省负责起草，皇帝同意后送门下省进行复核。若门下省反对此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中书省重新拟定。每一项命令，都需要门下省副署才能生效。门下省负责封驳的给事中，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威望较高，所挑选的人都是年纪比较轻，学问人品好而资历浅的人充任。他们的作用是拾遗补缺。君主有所遗忘，他们负责提醒。君主有了过失，他们负责弥补。历史上的名臣魏征、包拯都曾经长期担任谏官，他们的言谏对于其时政治的清明起到了积极作用。

言谏对于君权的制约是即时性的，另有一种舆论的制约则诉诸历史。中国文化历史上有非常发达的史官文化。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为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在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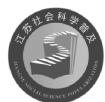
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古代史官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唐】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宋代司马光所著《涑水纪闻》，讲的是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对于极尽人间富贵的帝王来说，对身后的历史评价往往最为关注。明代海瑞给嘉靖皇帝的上书有“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话，嘉靖虽然很生气，但也不敢杀海瑞，主要还是怕在史书上留下昏君的骂名。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于君权进行舆论监督的还有廷议。廷议，又称朝议、集议，主要是国家遇到重大事情时由君主或者丞相召集主要中央官员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的一种制度。从秦汉到明清，历代都有廷议制度。参加者各抒己见，君主可以发表倾向性意见，但不能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当最终集体结论与君主意见相左时，一般情况下君主也要从众批准执行。有人统计《西汉会要》中廷议的相关情况，君主否决比例大约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宋仁宗曾经试图违规提拔宠妃的伯父担任要职，最终没能成功，除了由于包





拯、唐介等言官的进谏以外,廷议通不过也是重要原因。这一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君权的非正常行使,在相当大范围内保证重大决策不发生或者少发生失误,保证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有效运行(林乾《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

在当今时代,研究古代的君权制约传统不是出于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对于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反腐倡廉离不开权力制约,而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在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君主是九五之尊,但他仍然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这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能够相对比较平稳和延续时间比较长的原因。

其次,提高当代中国权力制约实效性的保证在于依据法律进行制度建设,而后由公民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权制约传统虽然自成体系,但终究效果不佳。除了唐太祖、宋仁宗等少数自觉接受制约的君主在其统治时期政治相对清明外,大多数朝代君权膨胀乃至独断是传统社会的常态,与之相应,社会政治的形势也是盛世少而乱世多。这说明,这一传统并未能把君主关进笼子。因为,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君主是否进笼子取决于其个体修养与道德良知,而非制度迫使他不得不进笼子。当代中国的权力制约要落到实处,依法进行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公民不再是民本思想中的臣民,而是具有自身权力和责任的社会权力主体,有能力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再次,反腐倡廉要重视信仰层面和道德价值层面。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但是光





有制度,而没有愿意执行制度的社会成员也是实效性不佳的原因。好的社会成员要有信仰、良知和道德追求,这一点传统社会主要靠天命来维系,而现代社会要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风尚来维系。

(本稿由南通市社科联推荐)



成云雷,1968年出生,江苏南通市人,山东大学毕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通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教学和研究,著有《先秦儒家圣人与社会秩序建构》《庄子:逍遥的寓言》《趣味哲学》《哲学的误区》《〈经世奇谋〉译评》《历史上的大冤案》等多部专著,发表论文30多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